

# 联盟为何走向瓦解<sup>\*</sup>

刘 丰 董柞壮

**【内容提要】** 在联盟政治研究领域,联盟瓦解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讨论。尽管国家之间为了应对共同威胁而结成联盟,但是威胁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联盟的解体。因此,联盟形成与瓦解的机制并不相同,维持联盟的条件消失或改变可能不会直接导致联盟瓦解。作者试图检验联盟瓦解的三项机制:威胁的上升和盟国间的冲突会导致联盟更容易瓦解;体系的不稳定以及联盟背景的剧烈变化会导致联盟的瓦解;当成员国面临的外部压力越大、国内观众成本越高时,联盟越不可能瓦解。这些机制表明,背景条件和维持条件的改变会引发联盟价值的改变,联盟内部成员会在比较联盟价值和抛弃成本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抛弃联盟。通过改进已有研究中的变量并引入新变量,借助新的联盟数据库,作者应用事件史的分析方法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对联盟瓦解现象的大样本分析表明,抛弃联盟是国家的一项战略选择,机会主义的表象背后反映了国家的理性考量,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联盟理论以及对周边国家联盟政策的理解。

**【关键词】** 联盟价值;双边关系;抛弃成本;联盟瓦解

**【作者简介】** 刘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董柞壮,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本科生。(天津 邮编:300071)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9550(2012)10 - 0004 - 28

---

<sup>\*</sup> 本文是笔者主持的2012年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美国海外军事干涉行为与国际秩序演变研究”(项目编号:12YJCGJW007)的阶段性成果。在写作过程中,陈冲对论文设计提供了宝贵意见,阿拉巴马大学的道格拉斯·吉布勒(Douglas M. Gibler)教授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尼尔·纳兰(Neil Narang)博士耐心解答了本文的数据问题,笔者在此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存在的疏漏由笔者负责。

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联盟政治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关于联盟形成的经典阐述认为,国家之间建立联盟的首要目的是应对共同的外部威胁。<sup>①</sup>然而,联盟有立有破,成员国废除其参与的联盟也是国际政治中经常发生的重要现象。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在联盟的形成、演变、管理以及联盟与战争的关系等问题上都做出了比较充分的讨论,<sup>②</sup>但是有关联盟瓦解问题的考察较为零散,尚未形成系统而成熟的研究。<sup>③</sup>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之所以缺乏重视,部分原因在于不少学者认为联盟瓦解的条件就是联盟形成和维持条件的改变或缺失。比如,有学者指出,“联盟的破裂源于盟友之间管理联盟互动的失败”。<sup>④</sup>事实上,联盟瓦解的条件与联盟形成和维持的条件并非互为对立面,而是有着不同的逻辑和机制。因此,研究导致联盟瓦解的不同因素及其背后的内在逻辑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联盟政治并在此基础上扩展联盟理论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的制约乃至遏制。目前在东亚,美国的联盟体系存在不断强化的趋势,如何有效应对美国的联盟体系,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战略环境,这也是中国学者有必要从联盟政治角度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

鉴于国际关系学界有关联盟瓦解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试图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双边关系对联盟瓦解的影响,从而发掘导致联盟瓦解的基本因素与主要机制。本文第一部分在回顾既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确定指出了本文研究的基本问题及其价值;第二部分对联盟瓦解的定义、机制和条件进行了讨论;第三部分选择事件史(event history analysis)研究方法对变量进行赋值;第四部分对统计分析得出的结果做了分析;第五部分对本文的主要发现进行了总结。

① 根据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研究,威胁主要包括综合实力、地理毗邻性、进攻能力和进攻意图,参见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ter 1。

② 对联盟形成的讨论可参见 Christopher Sprecher,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Timing of War Involvement,”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0, No. 4, 2004, pp. 331-347; Anessa Kimball, “Alliance Formation and Conflict Initiation: The Missing Link,”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3, No. 4, 2006, pp. 371-389;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1984, pp. 461-495;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James D. Morrow, *Game Theory for Political Scientis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有关联盟与战争爆发之间关系的研究可参见 Alastair Smith, “Alliance Formation and War,” *International Study Quarterly*, Vol. 39, No. 4, 1995, p. 405。

③ 阿维·科伯(Avi Kober)指出,学界对于联盟瓦解问题并没有对其给予应有的重视,参见 Avi Kober, *Coalition Defection: The Dissolution of Arab Anti-Israeli Coalitions in War and Peac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2002, p. 4。

④ 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7页。

### 一 有关联盟瓦解的既有文献考察

既有文献对联盟的维持条件有较多考察。比如,斯科特·贝内特(Scott Bennett)通过比较联盟维持的四种模型,发现“自主性-安全”交易模型和国内政治变化模型得到了显著支持。<sup>①</sup>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的一批学者们经过努力建立了“联盟条约与义务条款数据库(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简称ATOP)”。近年来,有关联盟政治的定量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根据布雷特·阿什利·利兹(Brett Ashley Leeds)和布尔库·萨文(Burcu Savun)的研究,联盟的瓦解有两方面的条件:维持条件的改变以及抛弃联盟的代价。<sup>②</sup>同时,借鉴有关联盟可靠性的相关研究,我们认为导致联盟不可靠的条件同时也是导致联盟瓦解的重要原因,尽管联盟不可靠并不必然意味着联盟的瓦解,<sup>③</sup>因为“联盟的制度化能够提高联盟终止的物质和非物质障碍”,<sup>④</sup>从而使联盟得以维系。鉴于上述考虑,在探讨联盟瓦解问题时,我们以联盟可靠性的研究和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为参考,同时增加对联盟瓦解的背景条件的考察。

第一,根据联盟形成的动机理论,联盟的主要价值在于借助他国力量威慑对手以增强本国的安全。当一国面临威胁时,可选的策略是通过结盟增强本国的防卫能力。如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利用博弈论方法研究表明,无论在大战略范畴还是在外交危机处理过程中,国家会通过传达联盟可靠性的信号给对手,从而提高对手国内的观众成本来约束其行动,或者通过联盟成员动员军队等手段给对手施压,以提高对手的外部成本,达到应对威胁的目的。<sup>⑤</sup>阿拉斯泰尔·史密斯(Alastair Smith)认为,由于联盟会给国家造成一定成本,所以能够影响国家的行为,但是影响结果并不确定。比如,防御性联盟能够预防战争,同时也会提高战争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联盟对战争发生的影响,而是联盟如何影响具体的国家行为。联盟的形成、可靠性

① D. Scott Bennett, "Testing Alternative Models of Alliance Duration, 1816 - 1984,"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1, No. 3, 1997, pp. 846 - 878.

② 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 "Terminating Alliances: 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9, No. 4, 2007, pp. 1118 - 1132.

③ 罗伯特·基欧汉认为,机制失效却依然维持的原因是存在“隐性成本”和“惰性”。参见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02.

④ 曹金绪《同盟政治理论的新发展》,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4期,第78页。

⑤ James Fearon,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1, No. 1, 1997, pp. 68 - 90.

与国家的行为是互动关系,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可以通过结盟实现应对威胁的目的。<sup>①</sup>利兹认为,联盟具有威慑和保证的功能,联盟的威慑性体现在警告挑战者发动军事冲突的行为会引发他国干预,通过可靠的条约降低战争的可能性。<sup>②</sup>

此外,联盟的价值还体现在联盟成员政策目标的一致化程度上。除了在军事领域外,国家间在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化程度也会影响联盟关系。安德鲁·朗(Andrew G. Long)和利兹的研究表明,包含贸易协议的盟国间贸易水平要高于非盟国间的贸易水平,也高于没有贸易协议的盟国之间的贸易水平。<sup>③</sup>合作的领域越广泛,盟国间的政策目标重合度就越高,带给联盟成员国的收益越高,联盟存在的价值越高,抛弃联盟的成本也越高。

第二,联盟成员国的属性影响联盟的存续和瓦解。本文研究的是国家出于机会主义考量放弃联盟条约义务而导致的联盟瓦解,所以我们需要研究不同类型的国家在联盟问题上的不同行为。比如,部分研究成果关注了制度类型对联盟可靠性的影响。布莱恩·莱(Brian Lai)和丹·瑞特(Dan Reiter)的研究提出了国家间结盟的三种逻辑:建构主义、经济相互依赖和可靠承诺。他们发现,只有可靠承诺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有效预测到制度类型相似的国家之间结盟可能性更高,但是民主国家除外。直到1945年之后,民主国家之间的结盟才变得更容易,而在1816-1945年期间,民主国家之间结盟的可能性较低。他们同时发现,文化类似的国家更容易结盟,而历史上有冲突关系的国家之间结盟可能性更低。<sup>④</sup>乌尔里希·皮尔斯特(Ulrich Pilster)对1946-2001年间的军事干涉行为进行研究后发现,民主国家是更有价值的盟友,也更愿意加入联盟。<sup>⑤</sup>但是,埃里克·加兹克(Erik Gartzke)和克里斯蒂安·格莱迪奇(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关于1816年至1992年间国家间结盟行为的研究却发现,由于参与外交决策的信息成本和利益集团等因素的影响,民主国家在联盟中并不都是很可靠的

① Alastair Smith, "Alliance Formation and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9, No. 4, 1995, pp. 405-425.

② Brett Ashley Leeds, "Do Alliances Deter Aggression? The Influence of Military Alliance on the Initiation of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7, No. 3, 2003, pp. 427-439.

③ Andrew G. Long and Brett Ashley Leeds, "Trading for Security: Military Alliances and Economic Agreement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3, No. 4, 2006, pp. 433-451.

④ Brian Lai and Dan Reiter, "Democracy, Political Similarity, and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1816-1992,"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4, No. 2, 2000, pp. 203-227.

⑤ Ulrich Pilster, "Are Democracies the Better Allies? The Impact of Regime Type on Military Coalition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7, No. 1, 2011, pp. 55-85.

伙伴。<sup>①</sup>

另外,有部分研究考察了联盟成员国之间实力对比情况对联盟关系的影响。詹姆斯·莫罗(James D. Morrow)研究发现,实力不对等的国家间联盟更容易形成和维持,联盟内部的大国和小国就国家能力范畴内的国家自主性和安全进行交易,使得成员国都可以从联盟中获益,因而有利于联盟的存续。<sup>②</sup>而利兹对联盟可靠性的研究发现,在实力不对等的联盟内部,由于大国和小国之间违约成本不同,大国违约受到的惩罚要比小国少得多,因此联盟更不可靠;而在实力对等的联盟内部,国家违约的成本较高,联盟反而更容易维系。<sup>③</sup>

此外,联盟成员国的地理位置对于联盟的维持和瓦解有一定影响。联盟成员之间的距离越近,产生摩擦的可能性就越大,且对于对方的威胁感知比较强,由此产生戒备心理从而不利于建立互信机制,导致联盟不容易维持。沃尔特的研究表明,由于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盟友之间的距离比较遥远,这些盟友对美国的安全承诺比较信任,也不会感受到美国的威胁,由此使得美国的联盟体系比较稳定,也有效抑制了针对美国的外部制衡行为。<sup>④</sup>

第三,有关联盟属性与联盟瓦解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联盟条款的内容决定了联盟的性质,影响到成员国的行为,并进而影响联盟的结果。“战争相关指数(Correlates of War, 简称COW)”数据库将联盟划分为三种:积极援助联盟、中立联盟和协约盟友。一些学者对联盟的机制化程度做了考察,如利兹和塞兹·安纳奇(Sezi Anac)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联盟的机制化和正式性程度高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一联盟就越可靠,二者甚至是负相关的关系。他们对此的解释是,机制化程度高的联盟所传递的威慑信号更为可信,从而减少了盟国与他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但是这类案例在总样本中所占比例较小。而且,由于终结一个机制化较高的联盟的成本要高于机制化程度较低的联盟,因此联盟成员国更愿意维持机制化程度较高的联盟。<sup>⑤</sup>

第四,对联盟可靠性的研究。如果联盟的某一个成员国在签约时处于战争状态,

<sup>①</sup> Erik Gartzke an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Why Democracies May Actually Be Less Reliable All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8, No. 4, 2004, pp. 775 – 795.

<sup>②</sup>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1991, pp. 904 – 933.

<sup>③</sup> Brett Ashley Leeds, “Alliance Reliability in Times of War: Explaining State Decisions to Violate Trea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7, No. 4, 2003, pp. 801 – 827.

<sup>④</sup>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pp. 86 – 120.

<sup>⑤</sup> Brett Ashley Leeds and Sezi Anac, “Allianc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Alliance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1, No. 3, 2005, pp. 183 – 202.

或者在盟约有效期内成员国与他国爆发了战争,都会对联盟的存续和结果造成影响,这是考验联盟关系的重要变量。例如利兹·萨拉·麦克劳克林·米歇尔(Sara Mclaughlin Mitchell)和安德鲁·朗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比例是74.5%),国家会履行联盟义务。<sup>①</sup>而利兹的另一项研究发现,成员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其国内制度的变化会增加违约的可能性,签约时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更可能落入联盟“陷阱”。<sup>②</sup>

通过上述回顾可以发现,既有研究对联盟的瓦解和可靠性做了一些讨论,涵盖了联盟价值、联盟属性、成员国属性和联盟可靠性等要素。不过,这些研究还存在改进的空间:首先,虽然联盟不可靠不一定意味着联盟会瓦解,导致联盟不可靠的因素也是导致联盟瓦解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尝试将联盟不可靠研究的背景因素纳入分析。其次,现有研究对联盟瓦解问题的讨论较为零散,贝内特的研究比较全面地讨论了联盟瓦解的四种模型,却没有提出统一的解释框架,也没有指出联盟瓦解的机制。再次,许多研究成果应用的是战争相关指数的联盟数据库,而这一数据库更关注联盟成员国的特征。相比而言,联盟条约与义务条款数据库包含联盟本身层面的数据,本文将使用新的数据对这类变量重新进行探讨。<sup>③</sup>最后,既有文献对联盟讨论较多考虑的是联盟双方的变化,对双边关系的变化这一中介变量关注较少。

综合以上原因,本文试图建立一个综合性框架,以便在特定的国际背景下分析联盟瓦解的原因和作用机制。由于联盟的瓦解是国家行为造成的,因此我们更关注国家间双边关系层面的因素对联盟瓦解的影响。

## 二 联盟瓦解:定义、机制及条件

联盟理论对联盟的瓦解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对于联盟瓦解的现有成果也没有给出联盟瓦解的机制。从逻辑上进行分析,联盟形成的主要目的是预防战争和应对威胁,国家抛弃联盟仅仅是联盟瓦解的表现,对这一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原因需要做更细致的考察。从联盟形成到联盟的瓦解,其间发生变化的不仅有促成联盟形成的条件,

<sup>①</sup> Brett Ashley Leeds,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and Andrew G. Long, "Reevaluating Alliance Reliability: Specific Threats, Specific Promis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4, No. 5, 2000, pp. 686-699.

<sup>②</sup> Brett Ashley Leeds, "Alliance Reliability in Times of War: Explaining State Decisions to Violate Trea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7, No. 3, 2003, pp. 801-827.

<sup>③</sup> 关于 ATOP 数据和 COW 联盟数据的对比可参见 Brett Ashley Leeds, Jeffrey M. Ritter,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and Andrew G. Long,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1815-1944,"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68, No. 3, 2002, pp. 237-260; 刘丰、陈冲《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5期,第18-41页。

还包括联盟的价值、抛弃联盟的成本以及国际背景的变化等因素。因此,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论据来支持这样的观点:促成联盟形成的条件发生改变或消失势必会导致联盟瓦解。

### (一) 联盟瓦解的定义

学术界对联盟概念的界定存在分歧。沃尔特在《联盟的起源》一书中将其宽泛地界定为“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合作安排”。<sup>①</sup> ATOP 数据库的定义则较为严格,其操作定义是,“至少两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官方代表签订的书面协议,内容包括承诺在军事冲突事件中对盟国进行援助,在冲突中保持中立,制止与他国的军事冲突,或者在能够造成潜在军事冲突的国际危机中保持合作与协商”。<sup>②</sup> 本文采用 ATOP 数据库的定义,<sup>③</sup>因为这一定义更为严格,也更具有可操作性。联盟的瓦解有不同的情况,利兹认为,联盟瓦解的现象包括被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废除、联盟到期、成员国丧失独立和新条约签订。<sup>④</sup> 本文关注的对象是被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sup>⑤</sup>废除的双边联盟,之所以选择双边联盟,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根据 ATOP 数据库,在 1815 - 2003 年期间的所有联盟中多边联盟只占不到 16%,其中被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废除的只有 33 个。其二,多边联盟与双边联盟在联盟管理和维持方面的机制不尽相同,联盟的瓦解日期对于不同的成员而言也难以统一。<sup>⑥</sup> 根据利兹和迈克尔·马特斯(Michaela Mattes)的研究,在 1813 - 2003 年期间,新的双边联盟的数量占联盟总数约 82.9%,<sup>⑦</sup>由此可见,国际政治中的联盟主要是双边联盟。与现有研究一致的是,由于 1989 年之后建立的双边联盟没有瓦解的记录,因此我们实际研究范围内的双边联盟都是在 1989 年以前建立的。

### (二) 联盟瓦解的机制

本文认为,联盟瓦解的直接原因在于联盟内部成员之间互动的失败,但是从动态

①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 12.

② 斯蒂芬·伯格曼(Stefan Bergsman)对联盟的定义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和讨论,参见 Stefan Bergsman, “The Concept of Military Alliance,” in Erich Reiter and Heinz Gartner, eds., *Small States and Alliances*, Heidelberg: Physica - Verlag, 2001, pp. 20 - 31.

③ Brett Ashley Leeds, Jeffrey M. Ritter,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and Andrew G. Long,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1815 - 1944,” pp. 237 - 260.

④ 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 “Terminating Alliances: 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9, No. 4, 2007, pp. 1118 - 1132.

⑤ 机会主义是 ATOP 数据库对联盟瓦解的表述,即联盟并非通过盟约规定的方式终结。

⑥ 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 “Terminating Alliances: 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pp. 1118 - 1132.

⑦ Brett Ashley Leeds and Michaela Mattes, “Alliance Politics during the Cold War: Aberration, New World Order, or Continuation of History?”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4, No. 3, 2007, pp. 183 - 199.

的角度看,在联盟形成到联盟瓦解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条件的改变,而这些条件的变化是如何导致联盟瓦解的?本文认为,第一,维持联盟条件和背景因素的变化导致了盟国之间互动的变化,从而影响到联盟存在的价值。具体而言,如果对手强大到联盟无法威慑的地步,导致该联盟无法给其中的国家带来额外的安全,或者盟国间由于历史上的冲突关系导致信任缺失,那么这些维持联盟条件的改变就会导致联盟价值的变化。如果成员国经历过战争、冲突甚至结构变迁等过程,也会促使联盟价值发生变化。第二,国家会将变化了的联盟价值与抛弃联盟的成本进行比较。如果对方是超级大国,或者本国是民主国家,那么抛弃成本就比较高,反之则比较低。在经过利益权衡之后,国家会做出维持联盟还是抛弃联盟的选择。联盟瓦解的机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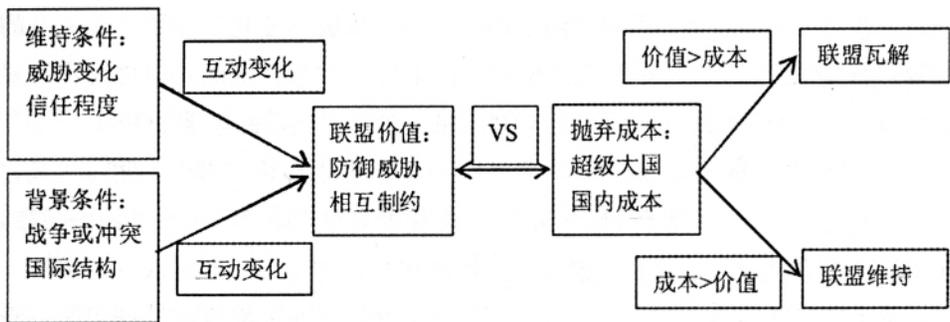


图1 联盟瓦解的机制示意图

我们可以推断,国家并非随意做出抛弃联盟的决定,因此利兹等学者关于国家废除联盟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的说法并不恰当。与结盟行为一样,抛弃联盟也是国家的安全战略选项之一,因此放弃联盟义务是国家理性选择的结果。

### (三) 联盟瓦解的条件: 研究假设

本文将联盟瓦解的条件归纳为维持联盟条件和抛弃联盟代价,同时参考有关联盟可靠性的研究以及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将联盟瓦解的背景条件加入到分析框架。利兹和萨文的研究表明,关于联盟瓦解与联盟形成的研究在变量设置上并不一致。研究联盟形成关注的是静态变量,比如是否存在共同威胁、国家声誉高低、国家间贸易状况等,而研究联盟瓦解更关注动态变量。由于联盟从形成开始到瓦解为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维持联盟的条件、抛弃联盟的代价以及国际背景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在利兹和萨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双边联盟瓦解的研究,主要关注了联盟形成到瓦解时间段内发生变化的自变量。

### 1. 维持联盟的条件

有关联盟形成动机的研究已有很多的积累。两国能够结成联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存在共性,这是联盟形成和维持的基础,反之,共性改变或者不存在,联盟的凝聚力就会下降,联盟瓦解的可能性就会提高。联盟形成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威胁,<sup>①</sup>因此共同威胁的存在是联盟形成的首要条件。不过,利兹和萨文的研究发现,外部威胁的降低与联盟瓦解之间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sup>②</sup>利兹和萨文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数据操作化存在问题。我们认为,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联盟机制的惯性,外部威胁的降低虽然使得联盟失去了存在价值,但是联盟继续可以作为管理两国关系的机制而存在。其二,联盟虽然没有瓦解,但是可能已经名存实亡,不再具备对盟友提供援助的功能。其三,外部威胁的升高也可能导致联盟瓦解,联盟成员可能放弃联盟义务转而对大国采取追随策略。<sup>③</sup>显然,威胁的变化会导致联盟关系的变动,而利兹和萨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威胁程度的下降与联盟瓦解的几率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sup>④</sup>基于这项研究,我们可以假设外部威胁的上升会导致联盟的瓦解。

另外,埃罗尔·亨德森(Errol A. Henderson)通过对1820-1989年期间的双边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文化因素对于国家间冲突的影响很微妙。文化对于冲突来说既不是主要因素也不是产生单向的影响。<sup>⑤</sup>布莱恩·莱和丹·瑞特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观点,在他们的研究中,文化上相似的国家更容易结盟这一观点得到了显著的支持。因此,具有共性的联盟更不容易瓦解,而共同的文化是国家间共性的重要方面。文化类似的国家间在相互理解和建立信任方面更有优势,类似的文化背景有利于联盟的形成和维持,这类联盟也更不容易瓦解。就文化而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美之间牢固的联盟关系。

另外,在联盟形成之前就存在冲突关系的国家联盟更可能瓦解。莱和瑞特认为,两国如果历史上存在冲突关系会导致两国既不愿意增加对方的安全,也不相信对方增

<sup>①</sup> 当然,形成联盟还有其他的目的,联盟还可以作为一种制度来管理冲突。参见王石山、王英《同病相怜与非洲联盟形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第78页。

<sup>②</sup> 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 "Terminating Alliances: 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pp. 1118-1132.

<sup>③</sup> 追随策略可参见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 of Alliances*, chapter 1.

<sup>④</sup> 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 "Terminating Alliances: 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pp. 1118-1132.

<sup>⑤</sup> Errol A. Henderson, "Culture or Contiguity: Ethnic Conflict, the Similarity of States, and the Onset of War, 1820-1989,"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1, No. 5, 1997, pp. 649-668.

加本国安全的意愿。<sup>①</sup> 比如,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和俄国这两个有冲突历史的国家分别于1910年和1916年结成联盟,但两次都非常短暂。如果互为盟友的两国视为彼此潜在的安全威胁,那么这种互相制约的联盟关系同面对共同威胁的联盟相比,它更可能瓦解。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如果联盟的共同威胁上升,则联盟更容易瓦解。

假设2:如果联盟成员之间文化背景不同,则联盟更容易瓦解。

假设3:如果联盟成员之间历史上存在冲突关系,则联盟更可能瓦解。

## 2. 抛弃联盟的代价

格伦·斯奈德(Glenn H. Snyder)认为,“抛弃”具有两种含义:一是国家与对手结盟或者放弃联盟承诺,二是不能完全履行联盟承诺或为盟友提供有效支持。<sup>②</sup> 在本文中,抛弃联盟的行为是取其第一种含义,即放弃联盟承诺。显然,联盟成员之间的合作不仅局限于军事方面。尽管随着在诸如经济等方面的合作加深,国家间冲突和矛盾的可能性也会增加。我们在认定联盟瓦解时认为,双边关系的破裂意味着联盟的瓦解。反过来考虑,如果国家采取机会主义行动而抛弃联盟义务,则双边关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正如利兹和安德鲁·朗的研究所发现的,盟友之间的贸易水平一般较高。<sup>③</sup> 这表明由于盟友之间紧密的安全合作关系,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牢固的政治基础,两国间互相信任的增加推动了两国各方面关系的发展。如果其中一方随意抛弃联盟,则会严重损害两国间的信任关系,甚至导致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两国的经贸关系也会受到影响。莱和瑞特认为,“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的国家更加关心彼此的安全”,<sup>④</sup>如果两国间的贸易依赖并不明显,那么国家就不会存在这方面的顾虑。比如贸易和平论的观点认为国家间贸易的发展有助于双边关系的改善。

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国家领导人的声誉。根据对国家声誉的相关研究之分析,国家在过去抛弃联盟会导致国家的声誉受损,进而影响未来潜在盟友与之结盟的意愿。有趣的是,如果国家在迫不得已或者极端困难情况下抛弃联盟会得到未来潜在盟友的

<sup>①</sup> Brian Lai and Dan Reiter, “Democracy, Political Similarity, and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1816–1992,” pp. 203–227.

<sup>②</sup>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1984, pp. 461–495.

<sup>③</sup> Andrew G Long and Brett Ashley Leeds, “Trading for Security: Military Alliances and Economic Agreements,” pp. 433–451.

<sup>④</sup> Brian Lai and Dan Reiter, “Democracy, Political Similarity, and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1816–1992,” pp. 203–227.

谅解,而随便抛弃联盟则会给国家的声誉带来严重的损害。<sup>①</sup>道格拉斯·吉布勒(Douglas M. Gibling)的研究将视角从危机行为转向国家领导人履行联盟条约的情况,考察履行条约对未来的联盟承诺和行为会产生哪些影响,结果表明国家声誉较好有利于未来的联盟形成以及在危机中获得可靠援助。<sup>②</sup>格雷戈里·米勒(Gregory D. Miller)的研究则认为,一国的声誉越好,那么该国在联盟中就越可靠,其他国家就更愿意与该国结盟,国家的自主性就会得到提升。<sup>③</sup>由此,我们认为国家抛弃联盟对于国家的声誉和未来的行为都会产生影响。声誉较高的领导人更不容易抛弃联盟,而声誉较差的领导人抛弃联盟的可能性更大。当国家对抛弃联盟的行为进行利弊权衡时,声誉较高的领导人会更多考虑维持良好的声誉,否则可能会面临高昂的国内成本。

同时,利兹和萨文的研究加入了实力对称这一变量。利兹和萨文采用的是COW数据中对主要大国的界定,但是考虑到国际结构因素后,我们发现这一设置可以进一步完善。因为在多极体系下,小国如果抛弃了与大国的联盟而投向其他大国并与其结盟,那么被小国抛弃的大国对于小国的制裁是有限的,而且由于大国数量较多,它们之间的互动频繁而多变,可以认为小国抛弃的后果并不会非常严重。本文界定的大国是指实力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并且具备全球武力投放能力的超级大国,符合条件的是冷战期间的美国和苏联以及冷战结束后的美国。抛弃与这些绝对意义上的超级大国结盟,其后果很难预料。

联盟成员国的属性对于其国家行为以及在联盟中的作用有很大影响。由于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内部权力结构和决策程序存在差别,领导人做出决策的国内政治成本也会不同。当前,有关国家行为的许多研究文献都会纳入民主国家这一变量,有关联盟形成、联盟有效性以及联盟瓦解的文献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对这一变量的不同定义以及赋值,更重要的是研究的时间范围不同,导致诸多的研究结果——包括联盟形

---

<sup>①</sup> Neil Narang and Brad L. LeVeck, "How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Matters: Linking Alliance Violations to the Formation and Design of Future Alliance Contracts," [http://polisci2.ucsd.edu/nnarang/research/LVN\\_AllianceReputation\\_UNDER40.pdf](http://polisci2.ucsd.edu/nnarang/research/LVN_AllianceReputation_UNDER40.pdf).

<sup>②</sup> Douglas M. Gibling, "The Costs of Reneging: Reputation and Alliance Form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2, No. 3, 2008, pp. 426-454.

<sup>③</sup> Gregory D. Miller, "Hypotheses on Reputation: Alliance Choices and the shadow of The Past,"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3, 2003, pp. 40-78.

成、有效性和瓦解——得出的结论千差万别。<sup>①</sup> 考虑到大多数研究中的时间转折点为1945年,<sup>②</sup>本文以1945年为分界,结合相关数据库对“民主国家”这一变量进行考察。我们认为民主国家抛弃联盟的国内成本比较高,因此我们将其归入到抛弃成本。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经济相互依赖弱的国家间联盟更容易瓦解。

假设5:领导人声誉越低,联盟越容易瓦解。

假设6:联盟成员国中不存在超级大国,则联盟更容易瓦解。

假设7:1945年之后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更不可能瓦解。

### 3. 背景条件

本研究将背景变量纳入分析框架。从联盟形成到瓦解的时间段内,背景条件的变化会对国家的安全考量并进而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对国家行为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由实力分布确定的国际结构。沃尔特对单极体系下的联盟行为所做的研究认为,结构对于美国的行为有重要影响,但是并不决定其他国家对美国霸权的反应。美国在地理上与大多数国家有大洋相隔,不像历史上的陆地大国那样具有侵略他国的便利,这一点缓解了其他国家结盟制衡美国的动机,而美国超群的实力地位更是限制了其他国家制衡美国的能力。<sup>③</sup> 同时,在单极体系下其他国家制衡霸权国的成本很高,这是因为结构的改变导致了均势生成机制的变化,进而导致联盟的可获得性和获得盟友支持改变权力分布的可能性降低。<sup>④</sup> 体系越稳定,联盟就越不容易瓦解。沃尔特强调了美国的优越地理位置,由于安全两难的存在,邻国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互相警惕,相邻的大国之间尤其如此。两国相邻意味着交往的便利以及对地区内共同威胁的认知,但同时也意味着产生矛盾的机会增加,从而不利于联盟的维持。

有关联盟与战争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联盟在经历战争或者危机等剧烈变革后仍

<sup>①</sup> 涉及民主国家联盟行为的研究可参见 Ulrich Pilster, “Are Democracies the Better Allies? The Impact of Regime Type on Military Coalition Operations,” pp. 55 – 85; Erik Gartzke an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Why Democracies May Actually Be Less Reliable Allies,” pp. 775 – 795; Brian Lai and Dan Reiter, “Democracy, Political Similarity, and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pp. 203 – 227; 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 “Terminating Alliances: 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pp. 1118 – 1132.

<sup>②</sup> 利兹和萨文的研究认为,民主国家的双边联盟在1816 – 1989年期间瓦解的可能性较低。莱和瑞特的研究发现,1945年之后在部分地区民主国家之间更可能结盟,而在整个时段民主国家这一属性对国家间结盟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

<sup>③</sup>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pp. 86 – 120.

<sup>④</sup> 刘丰《均势为何难以生成?——从结构变迁的视角解释制衡难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36 – 42页。

然可以存在下去。<sup>①</sup> 联盟的可靠性是联盟价值的核心。可靠的联盟可以有效威慑对手,实现联盟预防战争的目的。利兹、朗和米歇尔对联盟可靠性的研究发现,在战争时期只有 25% 的联盟是可靠的这一结论并不准确。他们使用 ATOP 数据做了分析,认为 74.5% 的联盟在战时都是可靠的。<sup>②</sup> 事实上,我们可以推论出,不可靠的联盟实际上是成员国不能按照盟约履行联盟义务,这必然会增加联盟的失效和瓦解的可能性,因此导致联盟不可靠的因素同时也是导致联盟瓦解的重要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联盟中的一方决定加入战争为另一方是否加入创造了履行盟约还是抛弃联盟的机会。<sup>③</sup> 这种机会对于领导人而言是一种考验。如果在有效期内出现了这种必须考虑是否履约的情况,那么联盟瓦解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另外,各国在结盟时会考虑盟友过去的联盟记录。比如,瑞特通过研究世界大战期间的联盟实践提出了联盟形成的“学习理论(learning theory)”。<sup>④</sup> 我们认为有过违约记录的国家抛弃联盟的可能性更高。由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 8: 体系越不稳定,联盟越容易瓦解。

假设 9: 邻国之间的联盟更容易瓦解。

假设 10: 联盟有效期内成员国经历过战争,联盟更容易瓦解。

假设 11: 联盟有效期内成员国经历过冲突,联盟更容易瓦解。

假设 12: 联盟成员有联盟违约记录,联盟更容易瓦解。

本文将分别对上述假设中所涉及的变量进行赋值,并根据数据的适用情况选择合适的分析方法来检验这些假设。

### 三 研究设计与变量赋值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联盟条约与义务条款数据库,<sup>⑤</sup>涉及范围包括 1816 年至 1989 年间形成并已经终结的双边联盟,我们一共得到了 277 份双边联盟数据。

<sup>①</sup> A. S. M. Ali Ashraf, "The Politics of Coalition Burden - Sharing: The Case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Ph. D. Dissertation,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99, p. 33.

<sup>②</sup> Brett Ashley Leeds,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and Andrew G. Long, "Reevaluating Alliance Reliability: Specific Threats, Specific Promises," pp. 686 - 699.

<sup>③</sup> Brett Ashley Leeds, "Alliance Reliability in Times of War: Explaining State Decisions to Violate Treaties," pp. 801 - 827.

<sup>④</sup> Dan Reiter, *Crucible of beliefs: Learning, Alliances, and World Wa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sup>⑤</sup> ATOP 数据可以在网址 <http://atop.rice.edu/data> 免费下载获取。

利兹和萨文对所有双边联盟的维持时间进行统计后发现,被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抛弃的联盟比条约到期或目标达成而瓦解的联盟维持的时间更长。由此看来,用联盟持续时间长短来衡量联盟的可靠性并不是一个可取的方法。<sup>①</sup>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采用事件史(event history analysis)的分析方法。事件史是用来分析事件动态过程的统计模型,事件是否发生以及何时发生是我们的关注点,其核心概念主要是事件即联盟是否瓦解以及风险集即观测时间区间内可能瓦解的联盟结合。分析事件史数据资料有三类基本的统计函数,包括分布函数、生存函数和风险函数。这些函数将时间序列数据转化为可用于多元回归和逻辑回归的新变量。我们关注的是联盟在有效期内瓦解的风险,因此采用事件史风险概率函数,在时间  $t$  上的失败风险率(hazard rate for failure)被定义为:

$$h(t) = \lim_{\Delta t \rightarrow 0} \frac{\Pr(t \leq T < t + \Delta t | \geq t)}{\Delta t}$$

其中  $h(t)$  代表瓦解风险率,分子代表在时间  $t$  和  $\Delta t$  之间的失败概率,分母表示时间  $t$  之后的失败概率。同时考虑到联盟瓦解的风险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而且本文的数据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是连续性的,因此我们最终采用的模型是连续时间风险模型。

ATOP 数据库提供了六种类型的数据。本文旨在考察联盟在存续时间内瓦解的可能性,即联盟的“瓦解风险”。生存风险期的分析单位为年,同时假定联盟在每一年中瓦解的可能性是相互独立的,由此可以建立一个联盟瓦解模型。由于联盟在存续时间段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联盟的合作层次以及合作内容会随着成员国的需要进行完善和调整,因此同一联盟在不同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比如,美日之间的联盟基本上分为三个阶段:1951年至1960年的“旧安保”阶段,1961年至1996年的“新安保”以及随后至今的美日“同盟关系”。鉴于此,我们在操作中将联盟进行细化,以联盟的阶段为研究对象,使用 ATOP 数据库中的联盟阶段数据进行衡量。与联盟形成不同,从联盟成立开始到联盟瓦解为止的时间段都是联盟瓦解的“风险”期。事件史分析方法适用于联盟瓦解的“风险”分析。<sup>②</sup>处在瓦解风险中的联盟阶段数量相当于二项变量分析中的实验次数。使用这一方法需要时间序列数据的支持,因此我们的分析

① 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 "Terminating Alliances: 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pp. 1118 - 1132.

② 对事件史分析方法的介绍可见丹尼尔·鲍威斯、谢宇著,任强等译《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章;劳伦斯·汉密尔顿著,郭志刚译《应用 STATA 做统计分析》,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章。

样本为“联盟阶段-年”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数据整合,一共可以得到3 866条的有效记录。

### (一) 因变量赋值

ATOP数据库对联盟的瓦解做了界定。联盟的终结包括四种情况:(1)成员国失去独立国家地位而不能履行联盟义务;(2)联盟条约到期或者联盟目标完成;(3)被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废除的联盟;(4)成员国以新的联盟取代了旧的联盟。在第一种情况中,联盟终结原因既不是联盟本身的因素,也不是联盟成员之间互动导致的,而是由于联盟之外的原因导致的,因此我们的研究排除了第一种情况。由于本文主要关注因为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联盟瓦解的原因,因此第二种和第四种情况可视为联盟正常终结,第三种情况可视为联盟瓦解,即条约到期之前联盟关系就非正常终止。利兹和萨文考察的联盟瓦解条件包括:成员国官方宣布联盟瓦解、成员国双边外交关系破裂、明显违背联盟主要义务、成员国与外国建立与原有联盟相悖的联盟。<sup>①</sup>由此,因变量只有两类情况,一类是联盟正常结束,另一类是联盟非正常瓦解。因变量可设为虚拟变量:联盟正常结束赋值为0,联盟非正常瓦解则赋值为1。

### (二) 自变量赋值

根据假设,本文自变量分为三类:联盟维持条件、抛弃联盟的成本以及背景因素。本文假设(1)、假设(2)和假设(3)中的自变量代表联盟维持的条件,假设(4)至假设(7)中的自变量反映抛弃联盟的成本,假设(8)至假设(12)中的自变量反映联盟瓦解的背景因素。

#### 1. 威胁上升

很明显,界定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和威胁的变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威胁之所以难以界定,是因为威胁同时包含了能力和意图两方面的属性。例如齐韦·毛兹(Zeev Maoz)在研究中提出了“政治上相关的国际政治环境(politically releva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简称PRIE)”<sup>②</sup>的概念来表示国家面临的威胁环境程度,这个概念主要用来反映威胁的意图。但是,国家间联盟是有针对性的,任何一个联盟都不会将国家所面临的所有威胁都纳入到联盟条约之中。利兹和萨文应用复杂的方法界定了国家面临威胁降低的程度,同时反映了威胁意图和能力。<sup>③</sup>因此,我们需要界定联

<sup>①</sup> 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 “Terminating Alliances: 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Journal of Politics*, pp. 1118 - 1132.

<sup>②</sup> Zeev Maoz, *Domestic Sources of Global Chang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sup>③</sup> 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 “Terminating Alliances: 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pp. 1118 - 1132.

盟所针对的威胁和威胁环境,进而界定威胁的变化。在对莱和瑞特、吉布勒以及利兹等人的研究数据进行适当修改的基础上,<sup>①</sup>我们用三组变量来表示威胁上升。第一,共同对手的实力变化,我们首先找到 ATOP 数据中条约条款明确规定的对手国家,根据 COW 数据库中“国家能力综合指数(CINC)”数据,<sup>②</sup>我们对其进行了匹配和比较,假如对手国的实力在联盟有效期内较前一年上升,我们将对手的实力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第二,对手数量的变化,根据齐韦·毛兹的“国家间双边军事冲突数据(MID)”<sup>③</sup>所记录的与联盟成员国发生过军事冲突的国家数量,我们将对手数量的变化设定为与成员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国家数量较前一年的变化情况。第三,对手国家数量是否增加,根据对手数量的变化,如果与成员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国家数量较前一年增加,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当然,这样做也有不足之处,因为数据只能反映最直接的威胁,无法反映潜在威胁以及他国的威胁意图。

## 2. 文化背景

本文采用宗教、语言和种族等三组变量来反映文化背景。文化的差异会影响国家对共同威胁的认同以及互相理解的程度,处于同一文化圈中的国家间联盟比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间联盟更可能瓦解。例如,如果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与北约(NATO)相比较,成员国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联盟的结果。由于无法获取COW数据中“国际体系成员文化综合指数”,因此本文采用了莱和瑞特以及吉布勒的“复制数据(replication data)”<sup>④</sup>。三组变量均为虚拟变量,分别为:是否属于同一宗教、是否使用同一语言以及是否属于同一种族,如果是则分别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 3. 冲突关系

国家间以往的冲突关系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如果曾经发生过军事冲突的两个国家将联盟视为互相制约的工具,而非互相增加安全的保障,内部不存在稳定性,那么这种联盟更可能瓦解。根据毛兹的MID数据,我们将冲突关系变量设置为结盟的两国之间在结盟之前的10年中是否有过军事冲突。该变量为虚拟

① 相关内容可参见 Brian Lai and Dan Reiter, “Democracy, Political Similarity, and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1816–1992,” pp.203–227; Douglas M. Gibler, “The Costs of Reneging: Reputation and Alliance Formation,” pp.426–454; Brett Ashley Leeds, Jeffrey M. Ritter,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and Andrew G. Long,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1815–1944,” pp.237–260。这些数据都可以从他们的个人网页免费下载获取。

② CINC 数据可以在网址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COW2%20Data/Capabilities/nmc4.htm> 免费下载获取。

③ Zeev Maoz, Dyadic MID Dataset (version 2.0), 2005, <http://psfaculty.ucdavis.edu/zmaoz/dyadmid.html>。

④ 该数据可以在吉布勒的个人网站上免费下载获取,参见网址 <http://bama.ua.edu/~dmgibler/replication.html>。

变量,如果两国在结盟前 10 年内有过军事冲突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 4. 经济相互依赖

贸易水平无疑会影响国家间的安全关系。安德鲁·朗和利兹探究了盟国之间的贸易关系,<sup>①</sup>但是并没有关注贸易对联盟的影响。如果两国贸易关系紧密,那么一方安全受到威胁对另一国的经济利益也是一种潜在的损害。因此,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高的国家冒着经济利益受损的风险抛弃联盟的可能性较低,尽管互相依赖的加深也意味着摩擦可能性增大。由于时间跨度问题,我们没有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其涵盖范围仅为二战后至今的贸易数据),而是采用 COW 数据中的双边贸易数据来测量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这一变量。<sup>②</sup>我们对联盟成员国双方的进出口总额相加取自然对数。参考约翰·奥尼尔(John R. Oneal)和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的做法,我们将缺失数据赋值为 0,因为数据为缺失更多反映的是经济依赖不明显而不是贸易额不确定。<sup>③</sup>考虑到真数不能为 0,我们在操作中对进出口总额加 1 处理,具体操作公式如下:

$$\ln trade(i, j) = \ln [1 + \sum trade(i, j)]$$

其中  $i$  和  $j$  分别表示联盟的成员双方,  $\ln trade$  代表双方进出口总额的自然对数,  $trade$  代表双方的进出口总额。

### 5. 领导人声誉

成员国领导人声誉的测量指标主要是成员国以往履行盟约的行为。在吉布勒看来,除联盟条约中的协约义务外,<sup>④</sup>其他任何一种联盟义务类型对于领导人声誉而言都是一样的,国家领导人履行义务则会给国家带来良好声誉。<sup>⑤</sup>我们用三组变量来表示领导人声誉这一变量:(1) 联盟成员领导人履行双边联盟义务,如果联盟中有一方领导人履行过与该国的双边联盟义务,在该领导人任期内,则设置虚拟变量“履行双边联盟义务”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2) 如果一方国家领导人在该地区曾经履行过联盟义务,在该领导人任期内,则将设置虚拟变量“履行地区联盟义务”赋值为 1,

① Andrew G Long and Brett Ashley Leeds, "Trading for Security: Military Alliances and Economic Agreement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3, No. 4, 2006, pp. 433-451.

② COW 双边贸易数据可以在网址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免费下载获取。

③ John R. Oneal and Bruce Russett, "Assessing the Liberal Peace with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 Trade Still Reduces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6, No. 4, 1999, pp. 423-442.

④ ATOP 数据按照联盟义务将联盟条款分为 5 种:进攻性联盟、防御性联盟、互不侵犯条约、中立条约以及磋商型联盟,这不同于 COW 数据的划分,参见 Brett Ashley Leeds, Jeffrey M. Ritter,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and Andrew G. Long,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1815-1944," pp. 237-260.

⑤ Douglas M. Gibling, "The Costs of Reneging: Reputation and Alliance Formation," pp. 426-454.

否则赋值为0。(3)如果一方国家领导人在体系内曾经履行了联盟义务,在该领导人任期内,则将设置虚拟变量“履行体系联盟义务”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比如,英国曾经与法国结盟并履行了联盟条约,则将英国领导人“履行双边联盟义务”赋值为1,将“履行地区联盟义务”赋值为1;如果英国与日本结盟,则将英国领导人“履行体系联盟义务”赋值为1。这三组变量是相互独立的。比如法国曾履行过与俄国的联盟义务,则将“履行双边联盟义务”赋值为1,将“履行地区联盟义务”赋值为1,将“履行体系义务”赋值为1。

## 6. 超级大国

尽管COW数据中包含“世界大国”这一变量,<sup>①</sup>而且得到许多研究的使用,但是我们还是尝试做出一些改进。考虑到结构因素和技术因素,一般大国对盟友的约束力并不强烈,特别是盟友抛弃后转投其他大国。因此,我们界定的主要标准是其具有超群实力以及全球投放能力的超级大国。实际上,主要大国和超级大国的行为逻辑是不同的,本文参考“国际危机行为数据库(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简称ICB)”<sup>②</sup>对主要大国和超级大国在危机行为方面的划分。符合超级大国条件的是冷战期间的美苏两国和冷战结束后的美国。该变量是虚拟变量:盟友一方为超级大国,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 7. 政体类型

现有研究对于民主国家的联盟行为存在很大分歧:由于参与外交决策的信息成本和利益集团因素,导致民主国家在联盟中并不是可靠的成员;<sup>③</sup>利兹的研究表明,有民主国家参加的联盟更不容易瓦解;莱和瑞特则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并非更容易结盟。吉布勒和斯科特·沃尔夫德(Scott Wolford)所做的研究表明:如果用联盟关系的出现来代替联盟的形成,那么民主国家的效应就是显著的,而且民主国家参加的联盟有助于改善威权国家的安全和民主化。<sup>④</sup>导致上述分歧的原因可能是1945年之前的民主国家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含义不同。鉴于此,我们设置一个新的变量,以便同时反映民主化状况和时间范围。对于民主国家的界定,我们采用“政体IV”数据库<sup>⑤</sup>的界

① COW 主要大国数据可以从网址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免费下载获取。

② ICB 数据可见网址 <http://www.cidcm.umd.edu/icb/dataviewer/> 的内容。

③ Erik Gartzke an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Why Democracies May Actually Be Less Reliable All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pp. 775 - 795.

④ Douglas M. Gibler and Scott Wolford, “Alliance, Then Democracy: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me Type and Alliance Form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0, No. 1, 2006, pp. 129 - 153.

⑤ 政体 IV 数据可在网址 <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免费下载获取。

定,这一数据库对各国的民主化程度每年进行报告,并且用-11分到11分的量表来区分民主程度,本文将得分在5分以上的国家定义为民主国家。针对1945年之后的民主国家在结盟上效应更为显著这一现象,我们设定一个虚拟变量,如果是1945年之后两个民主国家结成联盟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 8. 国际结构

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不同国际结构下国家的行为逻辑存在差异。从这一角度考虑,联盟瓦解的条件之所以不能等同于联盟维持条件的消失或改变,原因之一就在于实力分布影响着国家的联盟行为,因此我们将国际结构这一变量引入对联盟瓦解的分析,假设体系越稳定联盟越不容易瓦解。关于这一变量的测量,我们可以参考ICB数据库关于国际体系的划分。ICB数据库所搜集的数据开始于1918年:<sup>①</sup>1918年至1939年之前为多极结构,1939年至1945年之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至1962年为两极结构,1963年至1989年为多中心体系,1990年之后为单极体系。本文的研究范围始于1816年,因此需要将这一分类进行扩展:1816年至1913年为多极结构,1914年至1918年与1939年至1945年一样都属于世界大战,而ICB数据库中的多中心体系可以归为两极结构。上述变量值的具体赋值为:世界大战为0,单极结构为1,多极结构为2,多中心结构/两极结构赋值为3。

### 9. 地理位置

由于安全两难的存在,邻国之间的威胁感知更加强烈。相邻的国家既有可能面临共同的威胁,也有可能将彼此视为威胁。邻国间结盟不一定是为了应对外部的需要,也可能出于国内政治需要,<sup>②</sup>因此我们假设邻国之间的联盟更有可能走向瓦解。根据COW数据库的“国家距离数据(Direct Contiguity)”,<sup>③</sup>我们设置一个虚拟变量:国家间距离为0的视为邻国,赋值为1;国家间距离大于0视为非邻国,赋值为0。

### 10. 战争经历

关于战争经历这一变量,我们需要对利兹的变量设置进行改进。利兹和萨文认为,如果一方在签订盟约时已经要加入一场战争,或者一方在陷入战争后才寻求结盟,这样的联盟承诺更不可靠。<sup>④</sup>战争对国家安全和盟友关系都是考验。无论是战争的

<sup>①</sup> ICB对极结构的划分可参见网址<http://www.cidcm.umd.edu/icb/data/ICB1-2010-final.pdf>,第54页。

<sup>②</sup> 王石山、王英《同病相怜与非洲联盟形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第74页。

<sup>③</sup> COW国家距离数据可以在以下网址免费下载获取:<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COW2%20Data/DirectContiguity/DCV3desc.htm>。

<sup>④</sup> Brett Ashley Leeds, "Alliance Reliability in Times of War: Explaining State Decisions to Violate Treaties," pp. 801-827.

出现还是战争的结束(无论胜败),都有可能导致联盟瓦解。我们认为,在联盟有效期内经历过战争的国家所参与的联盟更有可能瓦解。采用COW的“国家间战争数据(Inter-State War)”<sup>①</sup>,我们设置一个虚拟变量:如果盟友一方或者双方在联盟有效期内发生过战争,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 11. 冲突经历

与战争经历类似,冲突经历也是基于对现有变量的改进。之所以同时纳入冲突经历与战争经历,是为了考察背景变量发生重大变化时联盟成员在不同程度的危机中的行为模式。冲突数据可以使用毛兹提供的双边军事冲突数据。该变量是虚拟变量:如果联盟的一方或双方在联盟有效期内与他国发生过冲突,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 12. 违约记录

与联盟声誉相似,我们将领导人违背除协约之外的任何一种联盟义务都视做违约记录。违约记录可以用三组变量进行测量:第一,联盟成员领导人违背双边联盟义务,如果联盟中有一方领导人违背过与该国外国的双边联盟义务,在领导人任期内则设置虚拟变量“违背双边联盟义务”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第二,如果一方国家领导人在该地区曾经违背联盟义务,在领导人任期内则设置虚拟变量“违背地区联盟义务”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第三,如果一方国家领导人在体系内曾经违背联盟义务,在领导人任期内则设置虚拟变量“违背体系联盟义务”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 (三) 模型

由于研究数据既有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也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我们选用能够同时处理这两种数据的考克斯风险比例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sup>②</sup>。Cox模型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partial likelihood approach,即PL),允许方程呈时间依赖性而不论其具体形式。我们对联盟在存续时间内的瓦解风险率建立模型,将联盟瓦解的风险作为因变量。

Cox模型对于样本的时间有限制,根本问题在于观测期之外的事件发生的概率无法得知,这一类问题被称为数据的删截(censoring)。本文的分析对象是1816年至1989年间瓦解的双边联盟,因此1816年之前——完全左删截(left censored)——以及1989年之后——完全右删截(right censored)——的数据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现有样本的时间序列数据信息。

<sup>①</sup> COW国家间战争数据可以在以下网址免费下载获取: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COW2%20Data/WarData\\_NEW/WarList\\_NEW.html](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COW2%20Data/WarData_NEW/WarList_NEW.html)。

<sup>②</sup> 对Cox模型的详细解释可参见劳伦斯·汉密尔顿《应用STATA做统计分析》第11章。

经历过瓦解发生的联盟  $i$  在  $t_j$  时经历瓦解的贡献为:

$$PL_i = \frac{\exp(x'_i \beta)}{\sum_{i \in R(t_j)} \exp(x'_i \beta)}$$

其中  $\exp(x'_i \beta)$  表示联盟  $i$  在时间  $t_j$  时瓦解的风险  $R(t_j)$  表示在时间  $t_j$  处于瓦解风险中的联盟集合即风险集  $t_j$  为常数,在公式中已经被消掉  $\beta$  为未知参数。因此,只有风险得分  $e^{(x'_i \beta)}$  和在时间  $t_j$  时处于风险集的联盟风险得分才能用来估计  $\beta$ 。部分似然估计函数为样本中所有  $m$  个事件时间上的贡献乘积:

$$PL = \prod_{j=1}^m \frac{\exp(x'_i \beta)}{\sum_{i \in R(t_j)} \exp(x'_i \beta)}$$

本文将使用模型嵌套的方式对 Cox 模型进行分析,分析软件为 STATA11.0。

## 四 统计结果及讨论

### (一) 模型设定

本文的模型设定如下:

模型 1: 联盟瓦解 =  $\beta_0 + \beta_1$ 1945 年后民主国家 +  $\beta_2$ 地理位置 +  $\beta_3$ 共同语言 +  $\beta_4$ 共同宗教 +  $\beta_5$ 共同种族 +  $\mu$

模型 2: 联盟瓦解 =  $\beta_0 + \beta_1$ 威胁上升 +  $\beta_2$ 对手数量 +  $\beta_3$ 对手数量上升 +  $\beta_4$ 冲突关系 +  $\beta_5$ 1945 年后民主国家 +  $\beta_6$ 地理位置 +  $\beta_7$ 共同语言 +  $\beta_8$ 共同宗教 +  $\beta_9$ 共同种族 +  $\mu$

模型 3: 联盟瓦解 =  $\beta_0 + \beta_1$ 双边贸易 +  $\beta_2$ 超级大国 +  $\beta_3$ 履行双边联盟义务 +  $\beta_4$ 履行地区联盟义务 +  $\beta_5$ 履行体系联盟义务 +  $\beta_6$ 地理位置 +  $\beta_7$ 共同语言 +  $\beta_8$ 共同宗教 +  $\beta_9$ 共同种族 +  $\mu$

模型 4: 联盟瓦解 =  $\beta_0 + \beta_1$ 战争经历 +  $\beta_2$ 国际结构 +  $\beta_3$ 冲突经历 +  $\beta_4$ 违背双边联盟义务 +  $\beta_5$ 违背地区联盟义务 +  $\beta_6$ 违背体系联盟义务 +  $\beta_7$ 地理位置 +  $\beta_8$ 共同语言 +  $\beta_9$ 共同宗教 +  $\beta_{10}$ 共同种族 +  $\mu$

表 1 列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统计,表 2 则是本文的经验结果。由于国家的文化因素和地理位置几乎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将这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模型 1 为控制变量模型,模型 2 检验了联盟的维持条件,模型 3 检验了抛弃联盟的成本,模型 4 检验了背景因素。模型的结果支持了我们大部分的假设。经济相互依赖、国家声誉、违约记录和文化因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地理位置则得出了与预期相反的结果。

### (二) Cox 模型结果解释

对于联盟的维持条件而言,假设1(外部威胁的上升会导致联盟更容易瓦解)得到了显著的支持。对手国家实力上升、对手数量变化以及对手数量上升等三个变量分别通过了95%、99%和99%的置信度检验。这表明,在外部威胁上升的压力下,联盟内部成员会出于减轻敌意或追随强国的目的抛弃原有的联盟。利兹和萨文发现,外部威胁的下降与联盟瓦解没有显著关系,<sup>①</sup>导致这一结论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对于外部威胁的界定过于复杂,另一方面则是外部威胁的下降仅意味着联盟价值的下降,而不一定导致联盟关系破裂。在最初设定的目标消失之后,联盟可以通过转型等方式继续存在,这也是ATOP数据库中将联盟划分为不同阶段的原因——联盟可以通过自我调整来重新产生价值。北约是最为典型显著的案例,在主要对手消失之后,这一联盟依然存在,并逐渐由军事组织转型为政治组织。联盟威胁上升导致联盟瓦解的典型例子是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小协约国(little entente)”。一战结束后,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组成了旨在防御德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军事联盟。后来,由于英法对德绥靖政策导致德国实力壮大,小协约国在德国的威胁下瓦解,罗马尼亚甚至成为纳粹德国的仆从国。结合常识分析,我们认为威胁上升导致联盟瓦解主要是联盟内小国的行为。沃尔特认为,导致国家采取制衡和追随两种行为的原因是威胁的来源不同,正如他在《联盟的起源》一书中所列举的德国案例,实力较强大的国家联合起来对德国进行制衡,而德国的周边小国采取了追随德国的行为。<sup>②</sup>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涉及小国的联盟在面临威胁上升时更可能瓦解。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小国维持本国安全的能力更弱,在面临威胁上升以及联盟威慑失效时没有多少可选项,而追随强国可以免受攻击或者在战争胜利后分享胜利果实。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强国威胁和拉拢对手的盟友,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和反法西斯联盟对意大利的拉拢和利诱。而在实力相当的联盟与对手之间,威胁的上升可能会导致联盟联系更为紧密。受限于威胁的界定以及缺乏联盟类型的划分,威胁程度与联盟瓦解之间更为细致的因果关系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假设2(即:如果联盟成员之间文化背景不同,联盟更容易瓦解)共同的文化因素没有得到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促进联盟形成的条件反过来并不会导致联盟的瓦解。而假设3(联盟形成前10年内的冲突关系得到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两国间的双边安全关系对于联盟瓦解而言意义重大。在利兹和萨文看来,“支持联盟成立的条件如果改

<sup>①</sup> 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 "Terminating Alliances: 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pp. 1118 - 1132.

<sup>②</sup>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chapter 2.

变,联盟就更可能违背最初的条款而导致瓦解”,<sup>①</sup>但这种解释略显宽泛。与联盟瓦解相关的因素包括联盟的外部威胁、成员双边关系和成员共性,这三类因素都是支持联盟成立的条件,但是当威胁上升、联盟双方历史上有冲突关系的时候,联盟更可能瓦解,而联盟成员共性的作用并不明显。(统计结果参见表1、表2和表3)

表1 联盟瓦解因素变量统计

变量名	观测数量(N)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瓦解	3866	0.03104	0.173448	0	1
对手国实力上升	3866	0.070874	0.256648	0	1
对手数量	3866	0	2.299558	-21	19
对手数量增加	3866	0.265391	0.441598	0	1
过去十年冲突关系	3790	0.190238	0.39254	0	1
双边贸易	3858	3.090691	2.996594	0	12.31059
超级大国	3866	0.265132	0.441461	0	1
履行双边联盟义务	3866	0.047594	0.212934	0	1
履行地区联盟义务	3866	0.090016	0.286241	0	1
履行体系联盟义务	3866	0.134506	0.341239	0	1
战争经历	3866	0.05432	0.226677	0	1
国际结构	3866	2.375323	0.912243	0	1
冲突经历	3866	0.053285	0.22463	0	1
违背双边联盟义务	3866	0.026384	0.160295	0	1
违背地区联盟义务	3866	0.069581	0.254472	0	1
违背体系联盟义务	3866	0.082256	0.274789	0	1
1945年后的民主国家	3866	0.236679	0.425098	0	1
地理位置	3866	0.401449	0.490255	0	1
共同宗教	3790	0.288918	0.45332	0	1
共同语言	3790	0.092876	0.290297	0	1
共同种族	3790	0.100792	0.301092	0	1

<sup>①</sup> 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 “Terminating Alliances: 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p. 1129.

表 2 联盟瓦解因素的经验结果

变量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双边贸易			-0.012 (-0.0493)	
超级大国			-1.015 *** (-0.382)	
履行双边联盟义务			0.328 (-0.568)	
履行地区联盟义务			0.169 (-0.564)	
履行体系联盟义务			0.703 (-0.452)	
对手国实力上升		0.648 ** (-0.285)		
对手数量		-0.268 *** (-0.0347)		
对手数量上升		1.001 *** (-0.211)		
过去 10 年冲突关系		0.995 *** (-0.25)		
战争经历				1.296 *** (-0.315)
国际结构				-0.210* (-0.113)
冲突经历				1.939 *** (-0.275)
违背双边联盟义务				-0.461 (-0.512)
违背地区联盟义务				0.326 (-0.573)
违背体系联盟义务				0.234 (-0.543)
1945 年之后的民主国家	-0.722 ** (-0.321)	-0.962 ** (-0.378)	-0.338 (-0.364)	-0.31 (-0.342)
地理位置	-0.500 ** (-0.231)	-0.498 ** (-0.227)	-0.464* (-0.242)	-0.304 (-0.24)
共同宗教	-0.229 (-0.247)	0.00872 (-0.243)	-0.365 (-0.255)	-0.0682 (-0.256)
共同语言	0.825 (-0.554)	0.36 (-0.461)	0.912 (-0.682)	0.705 (-0.547)
共同种族	0.244 (-0.549)	0.416 (-0.438)	0.157 (-0.646)	0.501 (-0.515)
N	3 440	3 440	3 432	3 440
Log likelihood	-442.709	-397.727	-432.582	-395.671
LR chi2	20.18	129.76	42.98	154.37
Prob > chi2	0.0012	0.0000	0.0000	0.0000

注: \*\*\*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括号内为标准差)。

表 3 假设与边际效应

	变量名	预期效应	对应假设	边际效应
维持联盟条件	对手国实力上升	+	支持假设 1	
	对手数量	+		- 30.83%
	对手数量上升	+		150.46%
	共同宗教	-	不支持假设 2	
	共同语言	-		
	共同种族	-		
	过去 10 年冲突关系	+	支持假设 3	166.22%
抛弃联盟成本	双边贸易	+	不支持假设 4	
	履行双边联盟义务	-	不支持假设 5	
	履行地区联盟义务	-		
	履行体系联盟义务	-		
	超级大国	-	支持假设 6	- 52.40%
	1945 年后的民主国家	-	支持假设 7	- 88.97%
背景因素	国际结构	-	支持假设 8	- 13.46%
	地理位置	+	不支持假设 9	- 55.18%
	战争经历	+	支持假设 10	
	冲突经历	+	支持假设 11	352.81%
	违背双边联盟义务	+	不支持假设 12	
	违背地区联盟义务	+		
	违背体系联盟义务	+		

对于抛弃联盟的成本来说,假设 4(即:经济相互依赖弱的国家间联盟更容易瓦解)经济相互依赖并没有得到显著性支持。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双方相互依赖的程度不同从而导致抛弃联盟的代价不对称。假设 5(即:领导人声誉越低,联盟越容易瓦解)国家声誉没有得到显著性支持,表明国家以前遵守盟约并不意味着以后还会遵守。原因可能是这一变量是对国家领导人履行盟约的记录,而(前一个领导人形成的)国家声誉可能不会过渡到下一个领导人”<sup>①</sup>即领导人带来的国家声誉只对该领导

① Douglas M. Gibler, “The Costs of Reneging: Reputation and Alliance Formation,” p.437.

人任期内的国家声誉造成影响。

假设6(即:联盟成员国中不存在超级大国,则联盟更容易瓦解)超级大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与超级大国结成的联盟更不可能瓦解,因为其中弱小的国家一方面得到超级大国的安全保障而不愿抛弃联盟,另一方面抛弃与超级大国的联盟可能导致超级大国制裁等严重后果。超级大国都是在二战之后出现的,此时的军事技术水平和实力基础足以支持其在全球范围内投放武力,并且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具有超强影响力,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对背弃联盟者进行制裁。同时超级大国还会以各种方式颠覆他国政权,比如,1973年美国策划颠覆了智利阿连德政府。反过来,超级大国基本没有理由抛弃联盟。冷战期间美苏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努力争取潜在盟国,因此与超级大国的联盟更容易形成和维持,更不容易瓦解。

假设7(即:1945年之后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更不可能瓦解)在1945年之后涉及民主国家的联盟更不可能瓦解得到了经验结果的支持。这表明1945年之后民主国家是更为牢固的盟友。这是由于国内政治制度和政策制定过程的民主化,使得领导人改变政策要面临高度机制化的压力,很难单方面宣布联盟瓦解。同时由于国内法制的传统,民主国家领导人对于具有法律效力的联盟条约不会轻易终止,而一旦领导人抛弃联盟从而对国家形象造成损害,很有可能遭到选民的惩罚而倒台。这表明国家在抛弃联盟时最为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国家安全和国内成本,而经济成本和国家声誉并不发挥显著作用。

背景因素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假设8(即:体系越不稳定,联盟越容易瓦解)国际结构得到了显著支持。在越稳定的国际结构中,国家面临外部安全环境剧烈变化的可能性越小,因此更不可能使用抛弃联盟这种手段来保护本国安全。假设10(即:联盟有效期内成员国经历过战争,联盟更容易瓦解)战争经历和假设11(即:联盟有效期内成员国经历过冲突,联盟更容易瓦解)冲突经历得到了显著支持,这表明,在联盟有效期内,如果成员国经历过战争或冲突等激烈变化,无论冲突结果怎样,联盟瓦解的可能性都大大提高。比如,二战结束后战胜了轴心国的英苏联盟和法苏联盟迅速瓦解,这并不是因为双方面临的威胁下降,而是战争的结果导致双边关系发生变化,尤其是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和利益分配的影响。而战败的轴心国集团联盟也同样瓦解,因为战胜国削弱战败国力量的一种途径就是削弱其盟国。假设9(即:邻国之间的联盟更容易瓦解)地理位置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其效应与我们的预期相反,表明邻国之间的联盟更不可能瓦解。假设12(即:联盟成员有联盟违约记录,联盟更容易瓦解)没

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与假设 5 类似,该变量反映的是国家领导人的背弃盟约的情况,主要对于该领导人任期内有效。

我们用表 3 中的边际效应来反映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大小,其中控制变量的边际效应采用效果最好的值。可以看到,边际效应最显著的是冲突经历,在联盟有效期内成员经历过冲突的联盟瓦解的概率要提高大约 3.5 倍,这有力地支持了我们有关背景因素的假设。另外,在联盟形成前十年之内成员之间有过冲突的联盟瓦解的概率提高约 1.7 倍,共同对手每增加一个联盟瓦解的概率提高约 1.5 倍,这两个变量显著支持了双边关系的变化以及共同威胁的上升会导致联盟瓦解。

同时,1945 年之后包含民主国家的联盟瓦解的概率比其他类型的联盟低约 89%,成员国包括超级大国的联盟瓦解的概率比不含有超级大国的联盟瓦解的概率低约 52%。这充分支持了抛弃成本越高联盟越不容易瓦解。

与我们的预期相反的是,邻国之间的联盟相对于非邻国之间的联盟瓦解的概率要低大约 55%。可能的原因是邻国之间如果抛弃联盟会对于双边关系的长远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总之,关于共同威胁、冲突历史、超级大国是否存在、1945 年之后国家属性的影响、体系的稳定性、联盟存续期间的战争经历和冲突经历等 7 项假设得到了支持,而文化背景、经济相互依赖、声誉因素、地理邻近性以及违约记录等 5 项假设没有通过检验。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对于联盟的瓦解而言,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共同威胁、冲突关系和冲突经历等三项因素。这也证实了本文关于联盟瓦解是国家理性选择结果的核心论断。

## 五 结论

联盟瓦解是国家间关系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加深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联盟甚至国家间互动。在充分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参考联盟形成、管理和瓦解的相关研究,对联盟瓦解的原因做了进一步的深入考察。利兹和萨文将联盟视做国际机制的一种形式,并从国际机制的视角对联盟瓦解的原因和方式进行了研究。本文则主要关注联盟瓦解的过程,即从联盟形成开始到联盟瓦解的时间内发生变化的条件通过何种机制导致联盟的瓦解。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新发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我们不能简单认为促进联盟形成的条件改变或消失就导致联盟的瓦解,事实上这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通过控制变量得出的研究表明,联盟的维持条件和背景条件的变化都会导致联盟价值的改变。改变后的联盟价值如果要大于抛弃联盟的成本,那么联盟的瓦解就会发生,否则,即使联盟价值发生了改变,联盟也不会瓦解。

其二,既有研究认为威胁下降与联盟瓦解无关,而本文的统计结果表明威胁的上升会导致联盟更可能瓦解。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大部分联盟是大国与小国或小国与小国组成的,而小国面临冲突和危机时更有可能不履行联盟义务。这一发现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涵,因为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面对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的制约,考察美国联盟体系的维持成本和联盟价值有助于在崛起中减少阻力。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周边小国并不必然捆绑在美国的联盟体系中,也有可能脱离与美国的联盟,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善中国的周边环境。

其三,本文的研究结果证明体系结构以及战争和冲突经历等背景变量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联盟的价值,进而影响国家的联盟战略选择。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改进,我们发现,其他国家与超级大国之间的联盟更稳定,1945年之后涉及民主国家的联盟更不容易瓦解,这对于理解国家的联盟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并启发我们用新的视角和方法来进一步研究联盟这一经典议题。

[收稿日期:2012-06-12]

[修回日期:2012-08-06]

[责任编辑:赵远良]

## Abstracts

### Why Alliances Collapse?

Liu Feng Dong Zuozhuang (4)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no due attention paid to and sufficient discussion about alliance collapse in the field of alliance politics. Although states form alliance to counter their common threats , the alliance will not dissolve immediately when the threats no long exist. There exist differences in mechanisms between alliance formation and alliance collapse , for the reason that what contributes to alliance collapse is not simply the factors to maintain alliance. In this article , we raise three mechanisms of alliance collapse: (1) the rise of external threats and previous conflict experience among alliance members may lead to collapse; (2) the more unstabl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background conditions are , the more probable collapse occurs; (3) last but not least , high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sts when superpower as an ally and domestic democratic polity always make alliance more stable.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changing conditions of background and alliance maintenance will lead to changes in alliance value , and the alliance members will make their decisions based on a comparison between alliance value and abrogation cost.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bilateral alliances formed between 1816 and 1989 by using Cox Hazard model , the authors conclude that states treat alliance abrogation as a strategy instead of an opportunistic behavior.

**【Key Words】** alliance value , bilateral relations , abrogation cost , alliance collapse

**【Authors】** Liu Feng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Nankai University; Dong Zuozhuang , Undergraduate Student of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Nankai University.

### Just War Theory and th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Wei Zongyou (32)

**【Abstract】** The Just War theory is a Western ethical theory answering when and how to resort to war , which was originated in the fifth century by the Christian theologian Saint Au-